

社会与历史译丛




[英] 彼得·伯克 著

#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

杨 豫 王海良 等译 杨 豫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会与历史译丛

[英] 彼得·伯克 著

#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

杨 豫 王海良 汪堂峰 赵庆寺 何奇松 译 杨 豫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 /

[英]伯克(Burke, P.)著; 杨豫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社会与历史译丛)

书名原文: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SBN 7-208-05817-2

I. 欧... II. ①伯... ②杨...

III. 文化史—研究—欧洲—1500~1800 IV. K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94025号

中文版译自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y Peter Burk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社会与历史译丛

##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

[英]彼得·伯克 著

杨 豫 王海良 汪堂峰 赵庆寺 何奇松 译

杨 豫 校

---

编辑、出版总策划 朱金元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王小阳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14.5 插页12 字数388,000

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5817-2 / K · 1144

定价: 36.00元

## 中译本前言

历史著作有自己的历史,文化研究也是在它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你们现在阅读的这本书写于三十年前,是1975年到1976年写成的,是我的第二本文化史著作。我的第一本文化史著作,《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 1972年)实际上是一本高级文化的社会史,是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他的著作《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间接影响了我的书名]和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安塔尔(Frederick Antal)的启发下写作的,尽管我也从其他社会学家[从艾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人类学家那里吸收了思想,尽管事实上当时我对艺术人类学还没有产生多大的兴趣。

当我写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史时,我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准确地说,什么算作“高级”文化?如何将它区别于“低级”文化或“大众”文化?这个问题有助于唤起我对大众文化发生兴趣,与此同时,在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年)那部经典著作的推动下,英国其他历史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也开始转向研究这一主题。人们确实可以说当时的欧美历史学家发动的这次“对大众文化的发现”,与过去那次对大众文化的发现,即本书第一章讨论的18世纪末的大众文化的发现,不

无相同之处。

我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开始于对 16 世纪和 17 世纪意大利的研究,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有必要在范围较宽的研究和范围较狭窄的研究之间做出选择。意大利并非适合于这种研究的地理单位,因为对当时——甚至包括以后——的普通民众来说,这个概念并没有意义,而且他们的忠诚完全集中于本地区。

在一个很短的时期,我曾经想写意大利威尼托地区的大众文化,但很快就注意到大众文化的一些类型和主题,尽管在那个地区本身看来这些都是非常独特的,而事实证明在其他地区,不仅在那个半岛上,而且在欧洲其他地区,也有相应的类型和主题。于是,我开始了一种目标更广阔的研究,范围从爱尔兰的西部(我父亲的家族源于那里)到波兰和立陶宛(我母亲的家族源于那里),甚至跨过了那个范围,延伸到了乌拉尔山脉。

由此产生的一本著作可以称作是一篇论文或论文集,对欧洲不同地区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比较和对照,并从大约十二种语言进行过研究(包括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进行过的研究)中吸收了营养,并以有关口头表演以及与大众艺术直接接触的记载为依据。我获得了英国科学院的资助,访问了挪威和瑞典的一些博物馆,那里收藏有 18 世纪大众艺术的丰富展品。我与丹麦和匈牙利等一些国家的民俗学家进行了接触,在那些年里,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正是由于我试图把欧洲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这本书因此被翻译成了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克罗地亚、捷克、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日本、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等国的文字。波兰文、爱沙尼亚文、保加利亚文和乌克兰文的翻译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当然,如果让我今天来写这个主题,我写出来的与这本书就不会完全相同了。许多研究已经开展,因此当本书的第二版在 1994 年问世时,参考书目已大有增加。如果出第三版的话,这份参考书目还需要更长一些。

更重要的是,学者们的观点(像其他所有人的观点一样)在这一代人

的时间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当这本《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在1978年第一次出版时,这种试图从民俗学家、文学学者和人类学家的著作中吸收成果的做法在许多职业历史学家看来仍然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在今天,在这个“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和“文化研究”制度化的时代,跨学科的研究几乎是理所当然的。

还有一点比这还要重要。从当前这一代人的身上看到了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兴趣日益增长,这与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有着必然的联系。在1978年,如果试图把欧洲视为一个整体,还会油然而生出一种大胆和兴奋的感觉。而在今天,纯粹从欧洲的角度进行观察,反而显得太狭隘了。即使是现在,如果要我开始从事大众文化的世界历史研究,我仍然会踌躇再三。我不懂中文和阿拉伯文,也不懂斯瓦西里语和盖丘亚语(更不用说,对许多非欧洲语言,几乎一无所知),而用西方语言进行亚洲和非洲大众文化研究的著作实在太少,还不足以凭借它们来进行充分的综合。

尽管如此,我眼下仍在从事着一些冒险,对欧洲和中国以及奥斯曼帝国进行一些比较,就像我在最近出版的《知识社会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中所做的那样。但是为了避免一种民族优越感,这样的比较需要由双方来进行。我的这本书能够让中国读者读到,我已经很高兴了。如果它能鼓励有些中国读者去进行中国大众文化史的研究,我将会更加高兴。但我最为高兴的是,如果其中的一些学者能够试图对中国的大众文化与英国或法国的,甚至与整个欧洲的大众文化进行系统的比较和对照。

彼得·伯克

2005年8月1日于英国剑桥

## 编辑说明

本书涉及大量人名和术语,读者可在索引中找到书中提及人物的简单介绍,索引也包含了一个术语表。本书注释中的许多参考文献的名称都缩略了,它们的全名请见“参考文献”。

本书由杨豫主持翻译,并统校全文。序、修订重印版前言、第一章、第二章初稿由王海良翻译;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初稿由汪堂峰翻译;第四章、第九章初稿由赵庆寺翻译;第七章、第八章初稿由何奇松翻译。

## 序

本书旨在描述和阐释欧洲的近代早期大众文化。“文化”乃是一个不精确的术语,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定义;我给它的定义是:“一个由共享的意义、态度和价值观以及表达或体现它们的符号形式(表演、作品等)所组成的体系。”<sup>①</sup>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但又不等同于生活方式。至于大众文化,或许最好是先使用否定的方式去下定义,把它定义为非正式的文化,即非精英的文化,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从属阶级”的文化。<sup>②</sup>在欧洲的近代早期<sup>③</sup>,非精英指的是整整一大批或多或少可以确定的社会群体,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工匠与农民。因此,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工匠与农民”(或者“普通人”)用作整个非精英的简称,它包含妇女、儿童、牧人、水手、乞丐以及其他的人等(这些群体内部的文化差异将在第二章里加以讨论)。

为了揭示工匠与农民的态度和价值观,这里有必要对雅各布·伯克哈特、艾比·沃伯格和约翰·胡伊津加等人创建的研究文化史的传统方法作一些修正,并向其他学科借鉴一些概念和方法。可资借鉴的学科当然就是民俗学,因为民俗学家们最关注“民间歌谣”、口述传统和仪式。

---

① 关于文化的定义,见 A. L. Kroeber and C. C.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 (1952), new edn, New York, 1963.

② A. Gramsci, *Osservazioni sul folclore, Opere*, 6, Turin, 1950, pp. 215f.

③ 欧洲的近代早期一般是指 1500 年至 1800 年。——译者注



本书中将要讨论的资料大多早已被欧洲的民俗学家研究过。<sup>①</sup>其中有些资料也被文学批评家研究过；由于他们强调各种文学类型的惯例，由于他们对语言的敏感，从而获得了洞察力，而文化史学家恰恰因缺乏这种洞察力而无所作为。<sup>②</sup>尽管阿赞得人或博罗洛人的文化与佛罗伦萨的工匠或朗格多克的农民的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研究前工业时代欧洲的史学家还是可以从社会人类学家那里学到大量的东西。首先，人类学家所关注的是从其本身去理解有差异化的整个社会，而历史学家直到最近仍然倾向于仅关注于上层阶级。其次，人类学家发现了行为者对其行动的意义看法时，并不就此罢休，而是继续去研究神话、想像和仪式的社会功能。<sup>③</sup>

本书涉及的时期从1500年前后到1800年前后。换言之，它相当于史学家常常称作“近代早期”的那个时代，尽管他们否认那个时代具有现代性。本书将要讨论的地域是整个欧洲，从挪威到西西里，从爱尔兰到乌拉尔山脉。人们可能会认为做这样的选择需要略做一些解释。

按照原来的构想，本书是一项区域性研究，而现在已经变成综合性研究的尝试。鉴于这个主题的规模，本书显然并不试图写成某种包罗万象的著作；相反，本书仅仅是由一组涉及重大主题的相互有关联的9篇文章组成。它们关注的与其说是个人的信息，还不如说是大众文化的规范，对大众文化的持续性和主要趋势作一简要的描述。选择这样宏大的主题有很大的弊端。最明显的弊端是无法对某个地区进行详细和深入的研究。此外，这必然会成为印象主义的描述，不得不放弃那种前景不可限量的计量方法，因为这一方法所使用的资料所涉及的空间之大和时

---

① 参见 G. Cocchiara, A. Dundes, A. van Gennep, G. Ortutary 等人的著作中开列的参考书目。

② 参见 M. Bakhtin, C. Baskervill, D. Fowler, A. Friedman, V. Kolve, M. Lüthi 等人的著作中开列的参考书目。

③ 有关本书提出的问题，特别有帮助的著作有 G. Foster, C. Geertz, M. Gluckman, C. Lévi-Strauss, R. Redfield, V. Turner, E. Wolf 等人的著作。

间之长,缺乏足够的同质性。<sup>①</sup> 不过,它的好处是可以起补偿的作用。在大众文化史中,常常遇到的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是在更为一般的层面上,而不是区域层面上,诸如定义的问题、解释变化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区域之间差异本身的重要性和限度。区域研究已经恰当地强调了这些变异,因此我的目的是做一些补充性的研究,设法把碎片拼接起来,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一个由彼此相关的各个部分组成的体系。我希望这幅展现一片广袤领土的小型地图将有助于为未来的探索者指明方向,但是,我在写作时心里还是想到了普通的读者;大众文化的著作是最难读懂的一种著作。

这里所选择的 1500 年到 1800 年的这个时期是个很长的时期,也是前工业时代欧洲史上文献记载最丰富的几个世纪,足以展现明显的趋势。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印刷术的出现破坏了传统的口述文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也把大量的口述文化记载下来了,从而使本书得以从印刷厂发行第一批宽幅书籍和小册子的时候开始讨论。本书的内容结束于 18 世纪后期,因为在工业化的推动下,文化的巨大变化已经开始,尽管这些变动在 1800 年没有对整个欧洲产生均等的影响。作为工业化的一个后果,我们在(尽量)进入近代早期欧洲工匠和农民的态度和价值观之前,有必要先驰骋一下我们的想像。我们暂且忘掉那些在活生生的记忆中把欧洲的各种方言标准化的电视、广播和电影,更无须提及那些不太明显但可能更为深刻的变化。忘掉那些可能比征兵和政府宣传更多地侵蚀了各省特有文化并且把地区转变为民族国家的铁路。忘掉那些普及教育和识字、阶级意识和民族主义。忘掉那些前进中的现代自信心(不管它如何受到了动摇)、科学和技术,以及表达了希望与恐惧的世俗风气。在我们得以重新进入“我们失落的文化世界”之前,所有这些(当然不止这些)都是必要的。

作为一种综合性研究的尝试,有些人可能会发现这项工作的时机尚

---

<sup>①</sup> 有关这一领域中使用计量方法的成功范例是 Bollème 的著作(1969 年)和 Svårdströöm 的著作(1949 年)。这两部著作分别研究了法国的历书和瑞典的绘画。

不成熟；我希望他们先仔细研究一下本书所开列的书目再下这样的结论。确实，大众文化只是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才从史学家兴趣的边缘移向其中心的，这要归功于朱里奥·卡洛·巴罗哈有关西班牙的著作、罗贝尔·曼德鲁和纳塔利·戴维斯有关法国的著作、卡洛·金斯伯格有关意大利的著作以及爱德华·汤普森和基思·托马斯有关英国的著作。然而，对这一主题的兴趣有悠久的传统。在德国，有历史头脑的民俗学家代代辈出，诸如沃尔福冈·布吕克纳、戈尔哈德·海尔沃思，或许还有奥托·克莱曼。20世纪20年代，挪威有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哈尔夫丹·科特，对大众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在20世纪初，芬兰的民俗学派，如卡尔勒·克罗因和安提·阿尔恩，对大众文化的历史发生了兴趣。在19世纪后期，杰出的大众文化研究者，如西西里的吉厄塞皮·比特莱和葡萄牙的蒂奥弗罗·布拉加，也对大众文化的长期演变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是，比特莱和布拉加的工作是一种收集传统的工作中的一部分，这种传统可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发现。我现在就开始来讨论那场运动。

## 修订重印版前言<sup>①</sup>

自从这部概述性的著作于1978年首次出版以来,有关大众文化的研究著作已经大批出版,其数量之多,超过了过去三四十年的总和。在法国、英国、德国、波兰以及整个欧洲,有关大众文化史的著作不仅有专著,而且有一些内容丰富的论文集。<sup>②</sup> 这些新的研究著作描绘了许多细节。随手拈来就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有两篇文章论述了海军上将弗农扮演了大众英雄的角色。关于这个主题,我在第六章用了几行的篇幅作了论述。<sup>③</sup> 更重要的是,有关过去的大众文化的研究中,更多的领域现已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例如,在宗教领域中,除了关于大众天主教和新教的

---

<sup>①</sup> 这篇前言是提交给学术会议的一篇文章,经过修改而成。该论文曾提交给“新史学”研讨会(1988年在德里举行)、“中世纪的人与物”研讨会(1988年在克雷姆斯举行)和“正在讨论中的大众文化”研讨会(1991年在科尔切斯特举行)。我要借此机会感谢这些研讨会的与会者对论文所作的评论和提出的建议。此外,我还从多年来的讨论中获益匪浅,与我讨论的有罗杰·夏蒂埃、纳塔利·戴维斯、卡尔洛·金斯伯格、盖博尔·克拉尼采和鲍博·斯克里布纳,还有我以前的学生戴维·金泰尔考、玛利亚-约瑟·德里奥和蒂姆·哈里斯。在此一并致谢。

<sup>②</sup> 关于法国的大众文化史著作,见 Bearoy(1976), Bertrand(1985); 关于英国的大众文化史著作,见 Yeo and Yeo(1981), Storch(1982), Reay(1985); 关于德国的大众文化史著作,见 Dülman(1983, 1992), Dülman and Schindler(1984), Brückner, Blickle and Schindler(1985); 关于波兰的大众文化史著作,见 Geremek(1978); 关于欧洲的大众文化史著作,见 Ginsburg(1979), Kaplan(1984), Dinzelbacher and Mück(1987)。本书后的参考文献按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查询。

<sup>③</sup> Wilson(1988); Jordan and Rogers(1989)。

大批文献外,又开始增添了有关大众犹太教的新著作。<sup>①</sup>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妇女文化的研究。这些研究尽管仍然比较零散(例如,较之妇女劳工的研究而言,是比较零散的),但它们确实填补了本书第一版(第49页)所指出的空白,尤其是宗教和医学领域中的空白。例如,通过研究犹太教的档案来考察母亲把超自然的力量传给女儿,或由姨母传给甥女。<sup>②</sup>

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史学家也发现了大众文化,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最初做出了怀疑的反应之后,开始转而肯定大众文化这个概念对他们的研究可能不无益处。<sup>③</sup>例如,日本史学家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研究大众文化。<sup>④</sup>中国史学家近来已转向了大众文化的研究。<sup>⑤</sup>至于南亚,这一领域中的重大事件是出现了一个“底层研究”群体(这个名称是向葛兰西所说的底层阶级表示敬意,本书第一章中对此将做讨论)。他们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重写了印度的历史。<sup>⑥</sup>东南亚的大众文化史研究正在崭露头角。例如,雷·伊莱托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原始反叛者”方式为榜样研究了19世纪菲律宾的宗教和异端。<sup>⑦</sup>科马尔·布拉思韦特的开创性研究著作出版以后,人们对加勒比地区大众

① Davis(1982);Cohen(1988);Horowitz(1989、1991)。

② 参见下文第59—60页。关于妇女文化的综合研究,见S. Ardener, *Perceiving Women*(1975);关于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主要参见Ankarloo and Henningsen(1990);Dekker(1987);Dekker and van de Pol(1981);Delumeau(1992);Henningsen(1990);Klapisch(1984);Medick(1984);Roodenburg(1983);Roper(1989);Ruggiero(1993);Wiesner(1988);Zarri(1990)。又参见Harris书中(即将出版)Amussen和Seleski所写的章节。

③ 关于史学家怀疑性反应的事例,见R. Gombrich, *Precept and Practice*(Oxford, 1971);Vrijhot and Waardenburg(1979)。Gombrich不相信存在“大众佛教”的观念,但W. J. Klausner不赞同他的观点。见W. J. Klausner,“Popular Buddhism in North-East Thailand”, in F. S. C. Northrop and H. H. Livingston(eds.),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New York, 1964);或见Southworld(1982)。

④ Gluck(1979);参见Walthall(1986),Shively(1991)。

⑤ Rawski(1979);Johnson, Nathan and Rawski(1985)。

⑥ Guha(1982—88)。近期的其他著作有Aris(1987),Kumar(1988),O'Hanlon and Washbrook(1991)。

⑦ Iletto(1979),参见Lê Thành Khôi(1986)。

文化史的兴趣与日俱增,巴西的大众文化史研究(对狂欢节、巫术、宗教信仰调和等进行的研究)也是如此。<sup>①</sup>西属美洲的大众文化研究大兴其盛,一位史学家走得很远,甚至围绕着西方化的文化、世界主义精英和更深地扎根于自己宗教的人民传统之间的冲突,组织编写了一部19世纪的拉丁美洲史。<sup>②</sup>

对大众文化的关切日益增强当然远不止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以及文学家同样关注于大众文化,而且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艺术史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最近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更无须说在英国“文化学”之称的界定宽松的领域中的教师们了。这些研究群体已经做出了出色的成果。<sup>③</sup>

所有这些努力导致的结果是,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的研究与它在1978年的状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至少我作如是观。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论述特定主题的专著,还是有关区域的专著,数量都有成倍的增加。它们将改变对欧洲的任何一种整体的描述,不过,也许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有关中国的研究,印度的研究,还是有关拉丁美洲的研究(此外,且让我们期待,未来有关非洲或中东的研究)也与这样的综合研究相关。这些著作通过对比欧洲所特有的东西来加以定义,并且原本未曾为之设计的状态(例如部落或种姓这样的社会径直划分成“精英”和“人民”)下对基本概念进行检验,从而揭示这些基本概念的优点和缺点。

过去15年围绕着一般的大众文化以及特殊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展开了争论。在这场讨论的过程中提出的所有见解,不可能用某个单一的公式来概括。它们当中包括一位研究近代早期的史学家最近向其同行提出的挑战,指责他们“拔高”了他们的主题,斥责他们在把过去

---

① E. K. Brathwaite, *Folk Culture of the Slaves in Jamaica* (1971, revised ed., London and Port of Spain, 1981). 关于巴西的大众文化史,见 Matta(1978); Pereira de Queiroz (1992); Mello e Souza(1987)。

② Burns(1980). 有关近期著作的概况,见 Rowe and Schelling(1992)。

③ Paulson(1979); Stallybrass and White (London, 1985); Frykman and Löfgren (1986)。

的大众文化理想化的同时又贬低现在的大众文化,从而失去了前后的连贯性。<sup>①</sup> 他所说的缺乏连贯性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但史学家的理想依然是既不要把它理想化,也不要对它进行谴责,只需要试图去理解我们前辈的态度和价值观。然而,有关的争论现在趋于集中在两大主题或两大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何为“大众”?第二个问题是何为“文化”?

## “大众”的问题

“大众”这个概念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存在问题的。同样,近来的讨论揭示出来的问题更多,或者说使这一困难变得更加尖锐。

当前,人们常常指出的一点是,“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这一术语给人以一种同质性的错误印象,因此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最好还是用复数形式,即“诸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s),或者用“诸民众阶级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popular classes)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取而代之。<sup>②</sup> 强调文化的差别、差异和冲突具有重要性的论点是很值得研究的,虽然我认为在第二章里已经提前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强调了文化的多样性,并且着重强调了“亚文化”的存在,而“亚文化”或多或少可以做出明确的定义。

对于有时被称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两层模式”,也遭到了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不同的大众文化与诸种精英文化(其多样性并不会更少)之间的界限是一种模糊不清的界线,故这一主题的研究者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二者的互动而不是他们的划分上。<sup>③</sup> 人们对俄罗斯伟大的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著作的兴趣日益增加,既反映也促进了重点从前者向后者的转移。他的大多数著作现已译成西方语言。他强调“越轨”的重要性显然与这里的讨论有关。他把狂欢节和狂欢作乐定义为“官方”文化的对立面,而不是精英文化的对立面,这标志着重点发生了

① Strauss(1991).

② Ginzburg(1979);参见 *Culturas Populaires*(1986)。

③ Gurevich(1981);Kaplan(1984)。

重大转移,接近于把大众重新定义为我们所有的人心目中的反叛者(如同弗洛伊德所描述过的那样),而不是任何社会群体都具有的特征。<sup>①</sup> 确实,在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许多关系,正如本人最近研究的四位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蒂奥菲罗·佛伦哥、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和皮埃特罗·阿莱提诺——的著作中试图展示的那样,我认为薄伽丘吸收了他参与其中的大众传统,佛伦哥讨论了这两种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阿里奥斯托重新讨论了借自高雅文化的大众主题,阿莱提诺则利用大众主题来颠覆高雅文化,或者,至少是颠覆高雅文化中他所厌恶的那一部分。<sup>②</sup> 早期的精英们偶尔也出于政治目的利用大众文化,例如约翰逊、赫里克、弥尔顿和马尔维尔等这样的英国诗人就用它来为传统节日作辩护。<sup>③</sup>

既然“大众”的观念带来了这些困难,史学家也许应该设法避开它。避开(如果不是逃避)这些困难的办法之一是“自下而上”地谈论历史。但是,“大众”这个观念的含糊性比表面看来还要严重。一部自下而上的政治史可能要涉及对“从属阶级”的研究,而且同样有可能会涉及美国人称之为“草根”的乡巴佬。自下而上的教会史很可能要叙述俗众,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文化层次。自下而上的教育史可能要涉及(与牧师或校监相对而言的)普通教师,但它可能更有理由去进一步陈述学生的观点。自下而上的战争史可能要陈述普通士兵而不是将军所经历的战争,但被卷入军事行动的那些平民的观点也应占有一定的篇幅。

在过去的几年中,在分析“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互动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观念是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的思想,爱德华·汤普森尤其喜欢使用这个观点。这个观点的含意是,“上层”应被解说为“统治者”,而“下层”则为“被统治者”或“从属者”。<sup>④</sup> 通过与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巴

---

① 参见下文第 224 页。对于在巴赫金的启发下进行的一些近期研究工作的概况,见 Burke(1988b)。

② Burke(1992b)。

③ Marcus(1986)。

④ Thompson(1991),76ff; 参见 Guha(1983),Hall(1981),Bailey(1987),9ff。



西、印度及其他国家的葛兰西派史学家的讨论,我才开始认识到我本人所做的研究政治性不足,没有充分注意到欧洲近代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对大众文化造成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一位史学家在研究1789年(比如)以前的任何时期,他或她所冒的风险就是过高估计被统治群体的政治意识,或以时代错误<sup>①</sup>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意识,或过高地估计国家的力量。例如,我依然认为罗伯特·马凯姆布莱德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就过分强调了国家在改变大众文化中的主动作用,而忽视了其他历史力量,如外省的《蓝色丛书》的小出版商们所起的作用。<sup>②</sup>

此外,在我的印象中,从事底层研究的印度史学家作出的假定过于轻率,认为他们关注的被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属于被统治阶级;就是说,例如孟加拉某些村庄里的农民,在经历了当地的地方性统治之后,率先意识到了他们与孟加拉其他地方的农民乃至整个印度的农民有共同之处。人民(无论“他们是谁”)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地方把自己视为“人民”,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难回答的。<sup>③</sup>此外,(即使是如此富有才智、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克里斯托弗·希尔、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已故的爱德华·汤普森对大众文化做出了卓越的研究,但是,当有人批评他们倾向于把“大众”等同于“激进分子”,而对大众保守思想的证据视而不见时,他们竟无言以对。

近期的一些研究著作孜孜不倦地求助于文化中的政治,尤其是求助于“文化霸权”,更有甚者,有人把葛兰西本人在分析具体问题(如教会对意大利南部的影响)时所使用的概念与它原有的语境割裂开来,多少有些不分青红皂白地用它来讨论范围大得多的情况。对于这样的做法,我的确有些惴惴不安。为了纠正这种滥用概念以及弱化概念的做法,我愿以提问的形式提出以下三项“使用指南”。<sup>④</sup>

---

① 时代错误(anachronism),亦译作现代化,是西方史学中的一个概念,系指用现代人的观念取代当时人们的观点来理解历史所造成的错误。——译者注

② Muchembled(1978).

③ Burke(1992a).

④ Lears(1985)提出了比我更多的问题,也对我的问题作了补充。